

〈孔子世家〉、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 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之解析

摘 要

司馬遷在〈孔子世家〉、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的論贊都提到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，對孔子，司馬遷是以欽仰的態度來讚許，期盼見到孔子在歷史責任的繼述中，那份偉大的襟懷與使命感；對屈原，則是垂涕想見其為人，帶有悲傷哀慟的同情在，而這份同情，亦含有自己遭受「腐行屈辱」的成分，司馬遷因李陵案的牽累類似屈原的生命際遇，所以，渴望見到屈原來獲得精神上的慰藉。

孔子周遊列國未獲青睞，屈原受讒而流放江、淮，司馬遷替李陵仗義執言卻反受腐刑，三人都有一個「不遇」的共通點，本文先由孔子、屈原對司馬遷的影響作論述，並評析贊語中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所透顯的意義，最後以「不遇去牽繫三人的生命價值，藉此明瞭司馬遷對孔子與屈原在歷史大義與生命情性上的認同。

關鍵詞：司馬遷、史記、孔子、屈原、孔子世家、屈原賈生列傳

一、前言

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後，能接續史官職責大義的就屬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了。《史記》主要以人物來記錄歷史發展的脈絡，對司馬遷來說，從黃帝到漢武帝，有兩千多年的歷史，光是篩選人物就已是浩瀚的工程，更何況還要為之詳實作傳。司馬遷費時十多年，終於完成這艱巨的任務，魯迅以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一語對《史記》的讚譽，鳴發出千百年來多數人的心聲。

在《史記》敘寫人物的過程裡，司馬遷採取不同的論述方式，藉由獨到的筆法技巧，暗含一些諷諭，比如將孔子安排在「三十世家」中，突顯對孔子的景仰與肯定；將呂后列在「十二本紀」裡，暗諷呂后的干政與弄權。而眾多人物中，司馬遷獨對孔子、屈原兩人，以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來作論贊，筆者認為，這句話應該也是司馬遷刻意安排的筆法之一，雖然《史記》洋洋灑灑五十餘萬字《史記》中，內容既廣且博，但太史公既然以《史記》祖述《春秋》，在用字遣詞上，必是字斟句酌，效法《春秋》大義的褒貶，因此，太史公將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，特用在孔子、屈原身上，必是凝慮而發，富有深意的。

二、〈孔子世家〉中司馬遷對孔子歷史大義的承繼

司馬遷欲見孔子的為人，是對其人格認同的嚮往，在〈孔子世家〉中，五千多言纏綿如貫珠，攢聚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孟子》…等先秦資料，將孔子的生平，言論、學行、周遊列國、著述等紀錄，發而為一篇完整的人物傳記，除了是對孔子一生的介紹之外，其中所隱藏的思想性格，及其所擔負的歷史責任，也在太史公的筆觸上，有所顯露，而這樣的文字組織，透露出對孔子情感上的連結，底下就司馬遷在〈孔子世家〉中所標舉的特點，及其對自身性格與責任的影響作一析論：

（一）孔子性格對司馬遷的影響

與其說司馬遷完全是自發思慕孔子的人格，不如說是導因於對漢初以來儒者性格丕變的厭惡，從高祖統一天下以來，直到武帝，傳統儒家講仁重義的觀念已有所改變，漢初以來的儒者，如：叔孫通、公孫弘之輩，多半已是外儒內法，或外儒內道，對儒家思想的取捨，混雜有功利價值的考量，這樣的風氣當然也肇因於高祖對儒生的唾棄所致，但這些儒生矯情干譽且變本加厲的做法，似乎漸漸在當時的社會政治上有錯向的引領，對照先秦儒者的風範，實有天壤之別，然而儘管如此，儒者在這樣的政局中，處高位、掌實權者所在多有。司馬遷在現實中不能直指其鄙行，只能透過文字，寓含褒貶，因此有〈劉敬叔孫通列傳〉、〈儒林列傳〉、〈酷吏列傳〉…等篇章從不同的價直批判來影射這些道貌岸然的假儒者，而這一手法，間接也促使司馬遷對孔子這樣一個儒家完整人物性格的追慕，在〈太史公自序〉中有云：

周室既衰，諸侯恣行。仲尼悼禮廢樂崩，追脩經術，以達王道，匡亂世反之於正，見其文辭，為天下制儀法，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。作孔子世家第十七。

載明作〈孔子世家〉的目的，對孔子欲「匡亂世反之於正」的襟懷，司馬遷銘感五內，而孔子無私的奉獻，渴望對天下百姓仁德的澤及，在在突顯出其真正的人格精神。此外，孔子對自己「道」的堅持，絕不隨俗妥協，即便未被國君採納，也不會放低標準，選擇「蓋少貶焉」²，孔子在諸子百家爭鳴的時局中，獨標以禮為出發點的思想，進而「攝禮歸仁、攝禮歸義」³，之所以特別去強調禮，主要是因為當時政經混亂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五倫的體制淪喪，而禮的功用恰巧在端名正分，因此，孔子特別對名分有所堅持，甚至不惜欲以此來重振周文的疲弊，所以即便附屬在出仕的機會上，他也不會輕易妥協，如：公山不狃叛季氏，欲召孔子相助，孔子想去，但子路不悅，孔子說：「夫召我者豈徒哉？如用我，其為東周乎！」⁴，孔子出仕的目的很明確，欲恢復周王朝時的禮制，但現實的政治統位並不確立，在回答子路的話就有些牽強，與他「正名」的論述有些違背，故最終孔子還是選擇不去，但也就是如此，可以看出孔子對自己原則的堅定，孔子困於陳、蔡時，回答子路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」⁵，對道的付諸，孔子有更深層的價值標準，現實環境的不如意，並不會迫使他有所卑屈，所以，孔子欲倡行仁義道德、《六經》學說，在他的執著下，儘管屢屢被打回票，但也就如此，得以反襯出孔子的性格，更加凸顯其價值的崇高，這也讓太史公引《詩經》之語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⁶來作最高的禮讚。

(二)、孔子作《春秋》給予司馬遷的啟示

〈孔子世家〉提到：

孔子曾說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」⁷

周公死後，孔子就以傳統文化的繼承人自居，對於天道所命定的事情，他不敢妄言，但無形中對這理念的執著，稟含有承天而受，繼之維護道統的使命，這樣的認知，也給與自己一種復興責任的動力，對於撥亂反正的責任，當然也就越發強烈，但孔子周遊列國十五年，歷經齊、陳、蔡、衛、楚…等國，卻都得不到國君的賞識，最終不得已還是返回魯國，據魯史作《春秋》，在孔子之前，因災禍戰亂的關係，造成許多典籍散失亡佚，在這樣的文化衰頹的世風，孔子對自己是有所期許的，他曾說：

¹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一百三十〈太史公自序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3310。

²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四十七〈孔子世家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1931。

³勞思光：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第一冊，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6年，頁112。

⁴⁴(宋)朱熹集註，蔣伯潛廣解：《四書讀本——論語》，〈陽貨篇〉，台北：啟明書局，2000年，頁264。

⁵(宋)朱熹集註，蔣伯潛廣解：《四書讀本——論語》，〈衛靈公篇〉，台北：啟明書局，2000年，頁232。

⁶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〈小雅·車鄰〉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0年，頁422。

⁷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四十七〈孔子世家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1919。

「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？」⁸孔子在意的是後世對其歷史地位的評判，即便本身理念下的「道」有所不行，但他還是要把積極入世的襟懷轉換成另一種形式來影響時局，或作為後世史官品評褒貶的依據，因此，利用殘存的歲月，發憤著述，完成《春秋》，孔子這樣的行徑和司馬遷作《史記》的精神際遇是能遙相契合的，在〈太史公自序〉中，司馬談對兒子的期許已有伏筆可循：

余先周室之太史也。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，典天官事。後世中衰，絕於予乎？汝復為太史，則續吾祖矣。今天子接千歲之統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從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！余死，汝必為太史；為太史，無忘吾所欲論著矣。且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夫天下稱誦周公，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，宣周邵之風，達太王王季之思慮，爰及公劉，以尊后稷也。幽厲之后，王道缺，禮樂衰，孔子修舊起廢，論詩書，作春秋，則學者至今則之。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，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，余為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⁹

司馬遷擔任太史令，不單只有對父盡孝，他在創作《史記》的過程中，紹述孔子的精神，對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歷史使命，是以歷史輪軸的接棒者自居，《史記》又載：

太史公曰：「先人有言：『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，本詩書禮樂之際？』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」¹⁰

但這不單只有心嚮往之的傾慕之情，司馬遷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」，化悲憤為力量於創作，最主要也是希望能以史官的身分，讓《史記》的價值擔負「究天人之繼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¹¹的歷史責任，而這樣的精神，恰巧與孔子是不謀而合，《春秋》內容寓含褒貶，在當時混亂的時局，對天下悖禮忘義之徒仍有所警戒，因此有「《春秋》之義行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」¹²之說，而《史記》對維護道統的社會正義也有所承繼，所論述的對象或涵蓋整個社會階層，例：〈游俠列傳〉〈龜策列傳〉、〈貨殖列傳〉；或以夾帶的方式來凸顯某些身分低賤的人物，例：〈魏公子列傳〉中的朱亥、侯嬴，司馬遷所要輝映的孔子精神，是以仁愛博廣的胸襟對天下百姓，孔子開平民教育之先河，司馬遷亦援引各階層人物來作傳，兩者所標舉都是史學家在社會公義的價值層面，司馬遷的承繼與發揚確有孔子的風範。

⁸(宋)朱熹集註，蔣伯潛廣解：《四書讀本——論語》，〈衛靈公篇〉，台北：啟明書局，2000年，頁240。

⁹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一百三十〈太史公自序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3295。

¹⁰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一百三十〈太史公自序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3296。

¹¹(東漢)班固著：《漢書》卷六十二〈司馬遷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，頁2735。

¹²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四十七〈孔子世家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1943。

三、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司馬遷對屈原生命情性的投射

屈原本楚國貴族，早期很受懷王的信任，年紀輕輕就受封為「三閭大夫」，但因遭上官大夫靳尚的讒佞，使懷王對其漸漸疏遠，屈原心有所不平，故將其悵惘的心聲，酌以楚地浪漫文風，發而為許多充滿情性的文作，因此在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有提及：

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〈離騷〉。¹³

《詩經·大序》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。」¹⁴詩人不平而鳴的情性古今皆然，屈原將其心志寓託在〈離騷〉等作品中，是想要給自己豐富的生命情感找到一個宣洩的窗口，因此作品中往往善用詩歌的語言，搭配天馬行空的想像力，誇張的修辭，來呈現其豐沛的情感，但這樣的情緒，是基於對現實際遇的不順，多少帶點怨懟、無奈的口吻，但也因此而能孕育出斐然的精神藝術作品，這一點映照於司馬遷，雷同性相當高。在司馬遷的血液中也流淌著「不平則鳴」的詩人性格，但司馬遷不單僅限在文字的創作上，現實生活中，他更以具體的行動來為李陵發聲，在〈報任安書〉中提到：「僕與李陵俱居門下，素非相善也，趣舍異路，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。」¹⁵可見兩人交情實屬泛泛，但他卻不惜觸怒武帝，而身遭腐刑，這比起屈原的流放，司馬遷所蘊積下來的憂憤情感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之所以他沒有選擇仿效屈原投江自盡的路途，是因為他有著超越生死的歷史責任在，但屈原不願屈從流俗，不惜犧牲性命，一樣值得感佩，司馬遷所要肯定的是屈原對楚國百姓的仁德襟懷，屈原的行止所突顯出的自我價值，不能用現世的標準去衡量，以屈原的長才，又身處戰國遊說之風盛行的時代，他可以擇木而棲，但屈原沒有選擇這條路，同樣的，那也是一種使命感，這使命感也許不同孔子那樣的層次，是對全天下的百姓而發，但退而求其次，亦是對楚地的人民而發，一樣是無所偏私的。因此，屈原投江自盡是把自我感情極致化的表現，背後所蘊含的是「孤臣無力可回天」的無奈，在這裡更可以說，他不願讓自己對國家那份情感，最後換來一幕幕國破家亡的慘劇，所以選擇犧牲，但也就在他犧牲的同時，生命價值的朗現達到極大化，如同文天祥的仁至義盡，倘若司馬遷真正見到屈原，應可暢所欲言李陵案中滿腔的委屈，而屈原想必也能心有戚戚焉，兩人在生命感性的悲嘆上，肯定是相當契合，司馬遷對屈原的垂涕，意味在同情之餘也想要給一些安慰，同樣的，也許在司馬遷的內心深處，他也需要這樣一個際遇雷同的知音，來給予一些慰藉的話語吧！

司馬遷對屈原的心有靈犀，感應特別獨到，他和屈原一樣在將生命價值發揮到極致，只是採用的方式不同罷了，更扼要的來歸結，司馬遷其實就是「化悲憤為力

¹³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八十四〈屈原賈生列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2482。

¹⁴(西漢)毛萇傳述，(宋)朱熹辯說：《詩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頁1。

¹⁵(東漢)班固著：《漢書》卷六十二〈司馬遷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，頁2732。

量」，這樣的做法和孔子比較接近，即便司馬遷現實的際遇比較像屈原，但某種程度也可以說，他有屈原豐沛的情感，但也兼有孔子理性的調和，漢初是黃老思想盛行的時代，這種雜揉型態的風氣，不單只見於學術思想上，在調和人生態度的過程裡，如此兼容並蓄的手法，也可適度援引在人格處世上，以當時身遭腐刑的司馬遷來說，這樣的調和，更是其安身立命最好的方式了。

四、司馬遷以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所要透顯的意義

司馬遷對孔子的仰慕與心嚮往之，從《史記》書中多處援引孔子的思想可窺見，司馬遷紹述孔子的精神，欲以《史記》的著述，來承擔歷史的責任。〈孔子世家〉提及孔子身處春秋亂世中，周遊列國，僅管曾困於陳、蔡，流於鄭、楚，被譏「喪家之狗」，但孔子並沒有因時運不濟，便對理想輟行，反將這份信念，轉投於史料典籍的整理與著述中，孔子精神裡所堅持的，是史官的大義，但這樣的大義未必合於流俗的價值觀，〈孔子世家〉載：

顏回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，雖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？不容，然後見君子，夫道之不脩也，是吾醜也。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，是有國者之醜也。不容何病？不容，然後見君子。」¹⁶

在這點上，和司馬遷本身的際遇有些暗合之處，司馬遷在李陵案中仗義直言，因而得罪武帝，在遭受「腐刑」之後，苟延殘喘於世，之所以選擇接受這樣的屈辱，是要肩負比死更重大的責任——撰述《史記》，在〈報任安書〉中有提及：

僕雖怯懦欲苟活，亦頗識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！且夫臧獲婢妾，由能引決，況僕之不得已乎？所以隱忍苟活，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。¹⁷

但這樣的心跡在當時不能夸夸其詞，因此，他必須忍辱負重，獨自面對外在的質疑與壓力，桑弘羊所影射的「無行之人」，多半也是指司馬遷了。在這樣的輿論下，司馬遷所要承繼的是孔子亦因困厄而發憤作《春秋》的行止，因此，就有一種「感同身受」的質樸在文章中流露，所以「想見其為人」，這不單只透顯仰慕的意思而已，孔子的人格與堅持，也讓司馬遷內化為其性格，藉以昇華成執著著述的動力。因此，想見孔子，是渴望在這條孤單的大道上，能有效法感召的對象，得以驅使他去擔負完成生命的歷史責任。

至於對屈原的感懷，司馬遷則偏重在缺少知己的慨嘆，在李陵事件中，司馬遷於〈報任安書〉有所怨懟：

¹⁶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四十七〈孔子世家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1932。

¹⁷(東漢)班固著：《漢書》卷六十二〈司馬遷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，頁2733。

而為李陵游說，遂下於理。拳拳之忠，終不能自列。因為誣上，卒從吏議。家貧，財賂不足以自贖，交遊莫救，左右親近不為壹言。¹⁸

人情的冷漠，讓司馬遷倍感孤寂，而這不就是屈原行吟澤畔時感嘆「舉世混濁而我獨清，眾人皆醉而我獨醒」的處境嗎？屈原在楚國的抑鬱不得志，雖堅執人臣之義，但對楚王又愛又恨的心理糾葛，迫使其生命難以灑脫，故將滿腹的心志，寓託在作品中，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中的贊語提到：

余讀〈離騷〉、〈天問〉、〈招魂〉、〈哀郢〉，悲其志。適長沙，觀屈原所自沈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為人。¹⁹

這裡想見屈原的為人，太史公是著重在知音難覓的悲嘆上，並非如同想見孔子般，去化約擔負歷史責任的孤寂，對屈原的同情，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慰藉的情感投射。悲屈原的茕茕獨立，其實也是悲自己在腐刑屈辱後的心境，受辱後的司馬遷因為史家責任未了，所以只能苟全性命飽受世人指摘，如此自我隱忍，吞泣這些屈辱的同時，對屈原際遇的感知，相信是很能共鳴的。因此，一樣「想見其為人」，對孔子的見，是滿懷歡欣期望之情，而對屈原，則是垂涕動容之情，同樣一句話所昭示出的差異，卻也突顯太史公在《史記》篇章中所架構理性與感性的雙軸線。

五、由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，連結出孔子、屈原、司馬遷的「不遇」

顏崑陽在〈論漢代文人「悲士不遇」的心靈模式〉一文中說：

以「伯夷、叔齊」、「孔子、孟子」、「屈原」為漢以前「士不遇」的三種典型性經驗，前兩者，君臣是建立在道義平等的對待關係上，「士」為被納入官僚體系的主從結構中，保有自主的選擇權，後一種類型，則在橫向的一統政治格局語縱向的官僚體系，被決定在無自主性的主從階級結構中。²⁰

〈孔子世家〉中，孔子周遊列國多年，不被任何國君所用，其下場就是一種「不遇」的代表，但孔子在現實上的不順，並沒有動搖他經世濟民的目標，孔子的「不遇」，是導因時代背景的影響，在當時各國爭戰講求富國強兵的風氣下，孔子的仁義思想，是很難在短時間立竿見影，當然也就難以被拔擢，對這樣的情形，孔子自己也明白，但他不強求，只求遇到能有遠見的君主，因此，不需太過以現實政治上的起用來評

¹⁸(東漢)班固著：《漢書》卷六十二〈司馬遷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，頁2730。

¹⁹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八十四〈屈原賈生列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2503。

²⁰顏崑陽著：〈論漢代文人「悲士不遇」的心靈模式〉收入《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1，頁214。

定孔子的「不遇」，孔子的「遇合」需搭配他整個思想學說在當時的時代意義去看，不然就太過窄化了。孔子的道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」光是了解，都已有所困難，更何況是確切付諸實行，因此孔子「不遇」的原因，不單只如上述所說，無法建立在君臣平等的道義對待關係上，筆者認為，即便有辦法連結這一層的關係，這樣的遇合肯定也相當薄弱，君王勢必要從現實上去驗收孔子的思想，甚至稽核任用孔子的效用，到那時，君王講求的就是儒家思想實效的價值，即便有再深的君臣道義關係，也不意味著能妥協在未見效用的情況下，在〈孔子世家〉中，晏嬰對齊景公說：

「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；倨傲自順，不可以為下；崇喪遂哀，破產厚葬，不可以為俗；遊說乞貸，不可以為國。自大賢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禮樂缺有間。今孔子盛容飾，繁登降之禮，趨詳之節，累世不能殫其學，當年不能究其禮。君欲用之以移齊俗，非所以先細民也」。²¹

可見道義的關係還須附屬有實效的成績，而這實效明顯是偏重在富國強兵上，孔子的遇才有可能產生，不然在那種背景下的政局，孔子即便有所遇也難以長久，必須等到政局大一統的情形下，才有可能著重在講仁取義的政策上，因此對孔子來說，他的「不遇」是時不與我的型態。

儒家的思想不見重於當世，但卻在往後的歷史綿延兩千多年，而孔子的地位相對也跟著攀升，因此，在現實的政治遇合上，孔子可說是個失敗者，但在歷史洪流與時代責任的遇合上，卻是一個繼往開來的關鍵者，這也讓太史公在對政治遇合感到無奈的同時，轉而去服膺孔子的歷史責任，尋求另一種歷史遇合的精神寄託。

至於屈原的不遇，和其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，看他對漁父的回答：

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！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蠱乎。²²

可見他是一個相當有原則的人，但在亂世中，堅持原則往往只能作孤臣，因此他的不遇是可想而知，屈原的不遇，參雜比較多自我情性的成分，但是否離開楚國，另謀高就，就可有不一樣的際遇，針對此點，筆者看來倒是未必，屈原將生命節操推為極致，使公義的價值超脫於生死上，一如孔子的道是不打折扣的，以他這樣的人格特質，能否獲得其他國家君王的知遇，應不只決定在國君的愚昧與否？在戰國的政局中，受重用的大都是縱橫家之流，如：蘇秦、張儀、范雎一類的策士，靠馳騁舌利，來獲取賞識，以屈原的性格，想必很難認同這類的人物，他既然會以投江自盡來闡發生命價值，就不可能會為求得到「賞識」而不擇手段，而這不擇手段，當然也包括「擇主而事」的策士行徑，屈原在際遇上的顛簸，是把個人和國家人民的情感綁在一起，因此，他把本身不順遂的鬱悶，發而對楚國在戰國時局中坎坷的悲

²¹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四十七〈孔子世家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1943。

²²(西漢)司馬遷著：《史記》卷八十四〈屈原賈生列傳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頁2486。

嘆，所以他的「不遇」，也可說是楚國的「不遇」，屈原對自己，有高潔情操的堅持，對楚國君臣，有「恨鐵不成鋼」的無奈，而這種理想與現實難以疊合的衝突卻都收納在他的情思中，以此為基所反應在外的處世態度，必然是澎湃多情，但也容易為情所役，因此，終致被國家大義之情所披覆，而走上絕路。

不過，屈原的「不遇」，和孔子相較是有所差別的，孔子的「不遇」受外在時局因素影響的成分大，屈原的「不遇」，則是偏重個人的內在性格，對司馬遷來說，漢代的政局已是大一統，即便對武帝有所不滿，他也沒有擇主而事的機會，因此，他的「不遇」，沒有孔子周遊列國的背景條件，和屈原的「不遇」比較雷同，但司馬遷的「不遇」相較於屈原，並沒有為情所困，他把這現實「不遇」的感情昇華為精神層次，尋求和孔子一樣的歷史遇合，因此他要「就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」，而孔子、屈原之所以是《史記》中為二司馬遷想見的人，最主要就是兩人的「不遇」都能讓太史公感同身受，也因如此，以「不遇」的軸線去與以聯繫，可在精神生命的脈絡上洞悉司馬遷與兩人的契合之處，進而探視出對其創作《史記》的影響。

六、結語

司馬遷對孔子精神的繼承，在《史記》的完成上可說是一個最好的證明，司馬遷真正受孔子的潛移默化，是願意去肩負歷史的責任，他不單只求完成父親遺志，對父親盡孝，更重要的是要超脫個人的現世責任，放諸到歷史洪流中的價值，除此之外，對孔子欲匡正亂世的人格，也是希望能有所承繼，因此，司馬遷想見孔子，孔子對他來說就像是他的偶像，那種發自內心的景仰，司馬遷也許渴望能當面跟孔子說說。而對屈原，幾乎是同理心的寫照發揮，司馬遷感召於屈原情感的深摯，對現世的生命價值有不同的解讀，欲藉由連結等質性的生命情感，跳脫歷史時間的限制，渴求知音的惺惺相惜，所以，可以這樣來歸結，「想見其為人」一語用在孔子身上，是尋求一個生命目標，存在的責任價值，用在屈原身上，則是尋求個人情感的慰藉，生命際遇的輝映。

七、參考文獻

(一)、書籍

- 1.司馬遷撰：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 年。
- 2.班固撰：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 年。
- 3.屈萬里著：《詩經詮釋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0 年。
- 4.朱熹集註，蔣伯潛廣解：《四書讀本 — 論語》，台北：啟明書局，2000 年。
- 5.李長之著：《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》，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97 年 10 月。
- 6.張大可著：《司馬遷評傳》，江蘇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 年。
- 7.勞思光著：《中國哲學史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崇基書局，1980 年。

(二)、期刊

- 1.〈論漢代文人「悲士不遇」的心靈模式〉顏崑陽著，收入《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1。
- 2.〈生命的輝映 — 司馬遷和孔子〉顏天佑著，《國文天地》第二十八期，1987 年 9 月。
- 3.〈從《史記》看司馬遷的政治思想〉來新夏著，收入《文史哲》，1981 年，第 2 期。